

遺毒深重的四個“政治金句”

螞蟻過冬

總是從道德教化入手,而不是從規則、制度上做防範。

比如,歷代國人都期待甚至默認統治者成為“明君賢相”,統治者也自我標榜“以德治國”,有義務規訓百姓。於是,古代中國一直無法走出“人治”社會,近代以來的“法治”轉型也艱辛曲折。

反觀西方傳統,大眾普遍相信“人性向善”,尤其是針對統治者。比如基督教有“原罪論”,孟德斯鳩有“十惡論”,休謨有“流氓假設”,聯邦黨人麥迪遜的名言最是膾炙人口:“如果是天使,我們無須政府;如果是天使統治人,將無須對政府施行內外限制。”

這種“人性幽暗”的前提,對熟人或陌生人都一以貫之,遍及宗教、政治、經濟等領域。所以西方人構建的政治關係,總是從完善制度、建立法治、限制公權力的角度切入,由此才產生了現代法治。

二、君臣如父子

第二個危害深遠的“金句”,是“君臣如父子”。該觀念源自周代禮法,以血緣關係為依據。歷代中國人對美好關係的想象,總是習慣於用血緣來類比。所以,君臣就該“親如父子”,地方官員就該“為民做主”。

但其實,這也是錯誤的類比,國就是國,同家沒有任何關係。把國等同於大號的“家”,使得中國政治變為了家庭倫理的延續,國君成為了大家長、大祭司。

在家庭倫理中,兒子不能挑戰父親的權威。所以在國內政治中,臣子必須永遠服從君主,缺乏獨立精神和正義原則。在國際秩序中總是以“父慈子孝”“大哥小弟”來想象國際關係。

而在西方世界,基督教主張“上帝之下人人平等”;中世紀的封建契約主張“我附庸的附庸不

是我的附庸”。所以後世產生的《權利法案》《美國憲法》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》等制度性文件,能夠確立“政府與人民對等、國家與國家平等”的現代思維。

三、天無二日,國無二主

第三個危害深遠的金句是“天無二日,國無二主”。中國自秦朝後,走向了絕對皇權,“天下必須由一人統治”的觀念,滲入每個國人的心中。

其實這也是個荒謬的類比,天下由誰統治,和天空有幾個太陽沒有任何關係。但這個錯誤觀念導致中國幾千年的專制大一統。

自秦以來,君主權力不容質疑和分享,失去了外部糾錯機制,國家的危亡係于一人。所以當權力被濫用,權威出現空缺,國家就會陷入周期性的動亂。

而在西方,從聖經到古希臘、古羅馬,都反復強調獨裁統治的危害、權力分散的必要。在中世紀、思想啟蒙之後,分權思維已經從觀念變成制度,成為維係和平、公正和自由的必須。

才有了阿克頓那句“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”的警句。最終長成了“分權制衡”的現代有限政治。

四、官場如戰場

而第四個危害深遠的“金句”,則是“官場如戰場”。中國的官僚體系經幾千年發展,盤根錯節、繁冗複雜。

中央和地方權力層層劃分、各級官員相互博弈,如履薄冰,遂將“官場如戰場”作為警世格言。

事實上,官場與戰場看上去類似,卻有本質不同。戰場是以消滅對手為目的,以勝敗論英雄。“官場如戰場”一說,常讓中國的政治場常硝煙瀰漫,彼此間爭個你死我活。東漢的黨錮之禍、唐代

牛李黨爭、明末的東林黨爭,都把政治完成了你死我活的權力遊戲;而每逢國家遭遇動亂,政治精英熱衷的都不是保護人權、維護秩序,而是“彼可取而代之”“逐鹿中原”等奪權思維,於是治亂循環就成為了常態。

反觀西方,一直有妥協平衡的政治傳統。比如阿克頓說“妥協是政治的靈魂”;英國貴族與王權達成妥協,實現了不流血的法治轉型;美國建國時多元利益集團相互妥協,保障了權勢和利益的平衡。所以說政治的核心是妥協,這也是現代議會民主制度的可能。

除了以上四個,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錯誤“金句”還有很多。遺憾的是國人迷信古訓,而當代國人不願讀書梳理,追根溯源,於是仍然受困於這些錯誤的觀念。只有深入中西方政治思想史,在傳統中國與西方文明的相互碰撞中,發現中西政治思想的優劣、相同與不同,才能找準現代政治文明的方向,對個人乃至群體做出清醒、文明的決策。為此,店長薦書誠摯推薦——“讀懂中西方政治思想”二書:蕭公權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,全面梳理中國分封、專制和近代政治秩序,以及起思想源流和演變。薩拜因《政治學說史》,以現代政治秩序的成型為線索,詳述了古希臘、古羅馬、中世紀和現代社會在西方的政治進程。



人是觀念的動物。思想、言語猶如種子,最終會影響文明大樹的走向。所以撒切爾夫人才會說:“小心你的思想,它會變成你的語言;小心你的語言,它會變成你的行動;小心你的行動,它會變成你的習慣;你的習慣最終會成為你的命運。”

很多流行的政治“金句”,其實就是危險的思想、危險的語言。他們不僅經不起邏輯推敲,而且極具迷惑性,影響著國人對世界、政治的認知。人類文明,說到底是政治文明的結果。因此,澄清以下四條歷史“金句”,對我們價值觀的重塑,意義深遠。



一、人之初,性本善

第一個危害深遠的“金句”,是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。人性問題,是一切社會理論的起點。

在中國人的思想中,對人性一向持積極態度。先秦時,儒家提出了“人性本善,猶如水之就下”。這一優美的類比,征服了廣大國民乃至整個東亞,流傳至今。

事實上,人性好壞,與水怎樣流動並沒有必然關係,這是典型的濫用類比。人性是異常複雜的,絕不是單純一句善惡就能回答的。這種“人性本善”的理論,構成了傳統政治反復失敗的根源。對人性的盲目樂觀,使國人在思考、踐行政治時,

1 用人是一門大學問。

有的領導用人不拘一格,尤其喜歡搞五湖四海。

這樣既能發揮集體的智慧,群策群力辦大事,又能分而治之,不讓某個團體一家獨大,另外還能給不同地方、不同系統的人提供上昇通道,有利于長治久安。

但有的領導用人方式單一,不自覺的就搞成團團夥伙。凡是私下忠於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,凡是和自己意見相悖的一概貶斥擯野,甚至人為的縮小上昇通道,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統的人難以獲得晉陞。

原因么,自然是上昇通道狹窄了,更方便篩選。

明朝太祖朱元璋,用人原則就是五湖四海,翻閱明朝洪武年間的史料,這樣的記錄比比皆是,下面簡單給大家羅列一些。

公元1370年,朱元璋下詔求賢:“誠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,其令有司悉心推訪以聞”,重點是尚未出仕和沉淪基層的人,試圖把天下賢才一網打盡。

公元1373年,朱元璋重新厘定選才制度,以聰明正直、賢良方正、孝悌力田等名目徵召知名士人,以儒士、孝廉、秀才、人才、耆民等名目徵召普通士人,以太學蒐羅各地學子。

朱元璋求賢,肯定有“拉攏士人、擴大明朝執政基礎”的因素,但朱元璋的求賢政策以及放手任用、破格提拔的魄力,也確實創造了明朝新氣象。

翰林院編修(正七品)高啓,謝徽的學識不錯,朱元璋問什麼都能對答如流,不禁大喜過望,當場提拔高啓做戶部右侍郎(正三品),謝徽做吏部郎中(正五品)。

因為跳過的品級太多,兩人擔心擾亂官場秩序,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。朱元璋也不惱怒,賞賜白金放回原職。

元朝遺民方克勤,明朝立國後出任縣訓導,相當於縣教育局長,後來響應朱元璋的徵召,參加了吏部開設的官員考試,名列第二,朱元璋直接提拔為濟寧知府,做了一方父母。

方克勤之子,便是名滿天下的方孝孺。禮部主事(正六品)曾魯,一個偶然的機會,發現安南國王陳叔明藏在奏表里的貓膩,維護了明朝的體面和外交利益,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賞識,立即提拔為禮部侍郎,跳過六個台階。

范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,做了正五品的戶部郎中,負責戶口、土地、賦稅方面的工作。五年後,范敏的工作出類拔萃,朱元璋青眼有加,任命他做了戶部尚書(正二品)。

蘇恭讓是河北玉田人,在朱元璋頒發求賢令以後,被評為“聰明正直”,一步到位,出任漢陽知府。履新數年,蘇恭讓便名滿湖廣。

除了單獨提拔晉陞,朱元璋還搞批發晉陞。朱元璋認為,論資排輩是對大多數人而言的,如果確實有非常之才,就不能用論資排輩的規則束縛他們——“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。資格者,為常流設耳,若有賢才,豈拘常例?”

在這樣的考量下,公元1378年,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員。

四年後,朱元璋又有兩次大手筆。其中一次是選拔成績優異的國子生24人,任命為府、州、縣的主官。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舉的860名士人,做六部、布政使司、府、州、縣的各級主官。

公元1385年,朱元璋調整六部人事,調太原

中國政治的一次偉大探索

溫伯陵

同知溫祥卿做兵部尚書,山東布政使徐鐸做戶部尚書,廣東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書,又一次在最高層落實了五湖四海的原則。

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銳官員,和“胡惟庸案”空出大量崗位有關係,但這種客觀因素,不能否認朱元璋有求賢之心、用人的魄力。

所以《明通鑑》里說:“一時山林岩穴之士,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迹矣。”

换位思考一下,如果你遇到這種“有功重賞、有過則罰”的領導,是不是和打雞血一樣渴望工作,是不是堅決不躺平?

2 破格提拔以外,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,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性嘗試。

例如明朝官員兼任太子朱標的東宮官員,並允許朱標預先批閱奏章,練習處理政務的能力。於是呢,朱標不僅成了明朝的常務副皇帝,也事實上承擔了宰相的全部工作。

皇帝和太子,不再是爭奪最高權力的競爭對手,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夥伴。

例如選拔侯子弟數百人,到國子學讀書,給將來科舉入仕、徵召做官奠定基礎。

這樣一來,和明朝榮辱與共的公侯子弟們,便可以與士紳地主出身的科舉文官分庭抗禮,朱元璋擁有分而治之的條件。

例如在立國初期,調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徽蠻將軍,晚年調韃靼指揮使安童做刑部尚書,並以“文武兼備”的理由,駁回禮部要求“立武學、開武舉”的請求。

朱元璋是要做法漢唐,用出將入相的標準來培養文武官員。

公元1384年,朱元璋正式開科取士,但他沒有過分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。

落榜舉人,朱元璋要量才錄用——“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,賜許觀等進士及第,出身有差。尋又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為主事。”

沒有參加科舉的國子學生,朱元璋可以直接授予布政使、按察使等高官——“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申,擢國子學生劉政、龍鐔等六十四人,授行省布政、按察使及參政、參議等官。”

公元1394年,朱元璋派出大量的國子學生,監督各地興修水利,同時觀察民生歷練政務。一年後,各地向朱元璋彙報,開塘堰40987處、治河4162處、修築堤壩5048處。

這些水利工程,就是明朝經濟復興的根本保證。

可以說,朱元璋能在一派廢墟上,親手締造出強盛的明朝,和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是強相關的。

3 但到朱棣做皇帝的時候,明朝的用人政策完全變了。

洪武年間那種大開大合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,在永樂年間的史料里,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迹,幾乎完全消失了。

永樂年間的用人政策,影響力最大的只有兩條。

首先是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,尤其是庶吉士的地位。

庶吉士是朱元璋設立的官名。每當科舉殿試放榜以後,考中一甲功名的進士,授翰林院修撰,考中二甲以下功名的進士,擇優授予翰林院編修、檢討等官職,品級從正五品到從七品不等。

那些進入翰林院的進士,以及分配到承敕監、六科的進士,統稱為“庶吉士”,而分配到六部、督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實務部門的,依然稱為“進士”。

因為年輕、能力不足、閱歷淺薄等因素,沒有分配工作授予官職,則稱為“觀政進士”。

相較而言,觀政進士的地位最低,進士的實權最大,庶吉士的地位最清高,但在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下,他們的前途都一樣,沒有高下之分。

但是在公元1404年,朱棣舉行了永樂年間的第一次科舉考試,一次性錄取470名進士,授予狀元、榜眼、探花為翰林院修撰、編修,同時選拔60名二甲進士進入翰林院。

這些進入翰林院的新科進士,統稱為翰林院庶吉士。

從此以後,觀政進士沒有了,只剩下翰林院庶吉士和普通進士。而因為翰林院是清高職位,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逐漸超過普通進士,成為明朝士人眼中最高貴的人群。

所謂的“非庶吉士不入內閣”,源頭就在這里。

其實不僅是不入內閣,到了明朝中期以後,如果不是翰林院庶吉士,你連六部尚書、巡撫、布政使都不一定能做。

對於明朝官員來說,這是真正的一考定終生。

至於落榜舉人、國子學生、鄉野賢才,更是想都不用想了。普通進士的政治前途都受限制,你們這些學渣還想有政治前途?

在學歷決定一切的永樂朝,如果沒有翰林院庶吉士的最高學歷,僅憑忠厚、老實、清廉、勇于任事等個人品質,朱棣是不可能發現你的。

從此以後,朱元璋的五湖四海用人政策,只留下“考進士、點翰林”這一個窗口。

而進士有師承、同年等私人關係,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個大院共事多年,等他們登上高位以後,自然更容易抱团取暖,形成各種各樣的團團夥伙。

腐敗也好,架空皇帝也罷,都是順理成章的。

其次是取消基層官吏的晉陞通道。公元1409年,朱棣召見了28名新任御史,發現其中4人的出身是“吏”,類似於辦事員、科員,朱棣大怒:“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,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”,然後便給吏部下了一道詔書:

“自今御史勿復用吏。”

既然御史不能用吏,那縣丞和縣令能不能用吏?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?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?雖然朱棣沒有明說,但不喜歡“吏”的態度已經表露無疑,那麼對於吏部來說,最安全的做法就是,全力培養翰林院庶吉士,降一格培養普通進士,選擇性培養出類拔萃的舉人,關閉“吏”進入明朝官場的大門。

這就導致明朝的“吏”沒有上昇通道,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,那麼“吏”做為明朝官場最廣大的群體,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,就是利用職務之便貪污腐敗、吃拿卡要、盤剝民生。

高層搞團團夥伙,基層搞吃拿卡要,明朝的政治生態怎么能清明呢?

所以後世評價永樂朝的時候,除了微漠北、下南陽、定安南以外,專門寫了一句:“官吏貪殘,非復洪武之舊。”

4 用大歷史的視角來看,朱元璋一輩子堅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,不完全是提拔新人、清洗舊人,為政治鬥爭服務。

我估計,這是朱元璋吸取宋朝科舉文官獨大的教訓,然後參考元朝重用色目人、回回、儒生的經驗,逐漸摸索出來的一條新路——

在漢唐貴族政治退場之後,重建一種能調動官員積極性、保持旺盛的戰鬥力、內部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態,避免和宋朝一樣,因為因循守舊的科舉文官而亡國。

朱棣修改朱元璋的用人政策,事實上打斷了這種全新探索,導致明朝的政治生態極大退步,重新走上宋朝的舊路。

中國下一次總結歷史經驗,探索可行的新路,已經是20世紀了,即教員在革命運動、生產車間、農村勞務、戰鬥英雄中選拔幹部,而不是只重視名牌大學畢業生。

名牌大學畢業生確實有專業知識、有開闊的眼界,但工農群眾不是沒有可取之處,老同志不是沒有獨特的經驗。脫離他們,就是脫離群眾了。

教員,從來不是脫離群眾的人。

公元1634年,明朝又到了科舉殿試的日子,崇禎皇帝朱由檢親自出題,其中兩道是和用人政策有關的題目——

士大夫的品行不端,吏治敗壞,如何糾正——“所與共治天下者,士大夫也。今士習不端,欲速見小。茲欲正士習以復道,何術而可?”

唐宋時文武不分,洪武年間能破格提拔人才,現在的文官隊伍,為何針插不進水潑不進——“唐宋曾以武臣為中書令、樞密使,文武似不甚分。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為布政、典史為僉都,今奈何牢不可破?”

希望參加科舉的士子回答這兩個問題,崇禎皇帝朱由檢,注定是要失望的。

如果真想知道答案,不如問問他的成祖文皇帝。